

乘鹤远去程应铨

○陈愉庆

父亲陈占祥与程应铨先生相识于清华新林院的梁家客厅。每到下午茶时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客厅总是高朋满座。梁先生把程应铨介绍给父亲时说：“这是我们建筑系的四大金刚之一，跟你同行，专门研究城市规划的程应铨。”

父亲说，他左手端着茶杯，伸出右手去跟程先生握手。程应铨却放下茶杯，站起身，微躬下腰，用双手握住父亲的手说：“久闻大名，陈先生。”他只比父亲小几岁，这样毕恭毕敬，让父亲很不好意思。

“都是同辈，这样折煞我也！”父亲连忙放下茶杯，把左手也伸了过去，握住了他的双手，“常听梁公说，你是中大的高材生。”

程应铨说：“哪里，你是中大教授，我不过毕业于中大建筑系而已。”他又指指梁思成夫妇和金岳霖、陈岱孙等人说：“在座的都是我的先生、前辈。”

父亲事后和梁先生说，程应铨很谦和呀。梁先生笑笑说，那是他很Gentleman(绅士)。应铨是很有个性的人，一身才气，也一身傲骨。他看得上的人，能肝胆相照，不入眼的，多一句话也不说。

程应铨是清华建筑系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，也是吴良镛教授当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同窗。毕业时二战尚未结束，因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，便在缅甸当了盟军的英文翻译官。1948年，经沈从文先生向林徽因推荐，来清华建筑系任教。系里成立规划教研组，程应铨是组长，率一批青年



1950年夏，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一届毕业生(前排7人)与教师于工字厅合影。3排左起周卜颐、高庄、罗哲文、刘致平、胡允敬、纪玉堂、殷之书，2排左起李斛、程应铨、郑孝燮、徐沛贞、张昌龄、吴柳生、莫宗江、汪国瑜

□ 人物剪影

教师专攻城市规划。由于在城市规划方面见地独到，被推举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，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。梁先生出席北京市的许多规划会议时，程应铨大多随行，这样也就和父亲接触得多了起来。

父亲说，程在缅甸做过盟军的英文翻译，能翻译出《都市计划大纲》（即《雅典宪章》）已属难得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他在短短的时间里自学了俄语，一连翻译出《城市规划》上、下卷，《苏联城市建设问题》，《城市规划与道路交通》，《柏林苏联红军纪念碑》，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关于城市规划的学术文献。由于有很深厚的国学功底，他的译笔娴雅流畅，灵动飞扬。凡是听过他讲课的学生，无不为了他的才情折服。

1956年，程应铨随梁思成、周荣鑫等出访东欧，归来后，他到横二条来看望父亲，给我留下很深印象。他为我带来了从东欧买回的小礼物，一条灰色亚麻的茶几台布，四周缀着红黑双色相间的十字绣花边。一支羊皮的书签，上面烙着精致的凹凸图案，那是一个右手高举宝剑，左手紧持盾牌的美人鱼。于是，程应铨很耐心地为我和弟弟讲了成为华沙城城徽的美人鱼故事。我们从此非常喜欢这位程叔叔。

我发现程叔叔很有趣。他和父亲永远都是谈规划、谈建筑、谈音乐美术或文学。从东欧归来，感触良多。大谈波兰规划思想大胆，有创意。还跟父亲说，他想马上自学波兰文，翻译一些波兰的城市规划著作，介绍给中国的同行。但他同样会跟母亲谈得笑逐颜开，说些家长里短。母亲对父亲说，应铨就是跟别人不一样，很实在，很家常。不像你的有些朋友，从一

进门就城市规划，到告辞之前还是城市规划，不食人间烟火一样。

1957年，父亲成为右派，程应铨也成了难兄难弟。程应铨是因支持“梁陈方案”，为此抱打不平而成为右派的。另一个原因是说他在课堂上散布西方资产阶级的城市规划理论，即伦敦哈罗新城的“邻里单位”观念。父亲说，1929年，美国建筑师帕里(A. Perry)率先提出了这一创意，美国规划专家克拉伦斯·斯坦(Clarence Stein)首次实践了这一理论。该理论的核心是每一个“邻里单位”的居民居住区，按照人口的多寡，规划出公共绿地、小型服务机构、商业设施、卫生所、学校、幼儿园……居住于同一地区的邻里们足不出居住区，即可享受到便捷的生活。大家在同一地区生活，邻居们相互稔熟，可以彼此守望照应，建立起一种安全和谐的邻里关系，不必为购物和接送子女上、下学而耗费时间及能源。苏联人对这一理论大加讨伐，批判者扬言此系阶级调和论。人群以阶级划分，焉可因合居同一地域而共生和谐？一棒将“邻里单位”打入冷宫。

斯大林逝世后，苏联对“邻里单位”理论的大批判一风吹，建设住宅时完全按照“邻里单位”依葫芦画瓢，只不过把“邻里单位”改了个名字叫“小区”。美国遍地林立的“邻里单位”则被译为“社区”(Communuy)。紧跟苏联老大哥的中国建筑界，连忙做出反响，为“邻里单位”罪名平反，程应铨也出席了清华建筑系为该理论昭雪的学术讨论会。

记得好像是1963年，我家已经搬进了复兴门外的宿舍大院。父亲刚刚摘了右派

帽子，从沙岭绿化基地调回了设计院的技术情报室。我周末从师大女附中回家，全家人正摆上餐桌准备进晚餐，听到敲门声，父亲起身去开门，看到门前那铁塔似的男人，我们都从餐桌旁站了起来。久违了，程叔叔！我们已经多少年没见到你了！父亲和程应铨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猛地紧紧拥抱在一起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此时两个饱经风雨的男人却已是无语凝噎泪满襟。父亲把他按在餐桌边，母亲忙去添碗加筷。从那天起，程叔叔仿佛成了我家的一个成员，若有几个周末不见他的身影，孩子们都会问：程叔叔哪儿去了？

自从成为右派分子后，父亲几乎息交绝游，跟任何人都鲜少往来，怕的是给亲朋们添麻烦。虽不再与程应铨联络，但父亲总对他怀着一份深深的愧疚。

“应铨是为我和梁先生陪绑的，很多话他本可以不说。多少人不说，或违心地说，就躲过去了，要么爬上去了。他是宁折不弯的人，结果妻离子散。”我常听父亲在家里为程先生叹惋感慨。

程先生仍像以前一样开朗，说起话来声如洪钟。那时程先生正值盛年，身高一米八，威猛健硕，因长年骑车，皮肤被阳光染成古铜色。额前几道皱纹，更增添了男子汉的沧桑与刚毅。虽妻子已携一双儿女离去，但丝毫看不出他的沮丧与哀戚。

程应铨虽然戴了右派帽子，但因为他的讲课极受学生欢迎，所以一直还在系里授课，不曾被剥夺授课权利，工资也维持原样。

可能是为了排解孤寂，独身一人的程应铨迷上了摄影。凭他的智商，想做什么就能把什么做到最好。那几年，他的很多

业余时间都花在摄影上，我们也成了他的摄影模特儿。我一生中几张拍得最好的照片，都出自程叔叔之手。他每周六晚上独自在宿舍的暗房里洗照片，周日一早便骑车进城，买各种相纸、胶卷、冲印药粉，然后去各家各户送他洗出的杰作。总是最后来到我家，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。在程叔叔向我们展示的摄影作品中，我们认识了许多不相识的人，他对着照片给我们讲述着那些动人的故事。我很早就从照片上认识了清华水利系著名教授黄万里，看到过他孤身为中国水利事业坚韧跋涉、饱受磨难的沧桑面影。黄万里教授传记《长河孤旅》所用的照片，正是程叔叔拍摄的。沈从文先生和侄女的合影最精彩。沈先生弟弟那来自湘西凤凰的女儿，一副出水芙蓉、冷花淡蕊的清雅，让我过目不忘。程叔叔说，她没读过多少书，但音乐、绘画、舞蹈、女红均无师自通，联想沈先生的外甥画家黄永玉，真觉得凤凰是片神奇的土地，哺育了多少风华绝代的艺术大师。据说，《沈从文全集》中的照片，也出自程应铨之手。而《城记》、《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》等书中父亲和我们全家的照片，亦是程叔叔的作品。

在程叔叔自己保留的作品中，我们看到许多照片里都有一张熟悉的面孔，那是大哥衍庆清华建筑系同班上的一位女同学。暑假里大哥接我和弟弟去清华小住时，见过这个窈窕婀娜、笑容若桃花映水的上海姑娘。

母亲指着照片上的姑娘，看了程叔叔一眼，笑道：“进展顺利吗？”

程叔叔丝毫不否认，大大方方地说：“我们常约会。照照相，逛逛街，吃吃

□ 人物剪影

饭，也很亲密。至于结果如何，像你说的，随缘吧。”

母亲说：“怪不得衣冠楚楚，老像要去赴酒席，原来情网缠着呢。喏，让我来指教指教你。”母亲指着他笔挺的华达呢中山装说，“是自己熨的吧？”“是呀，嫂夫人有何见教？”程叔叔低头看着自己的衣襟问。

母亲用小锅热了一点白醋，用湿毛巾蘸了些醋在中山装发亮的地方擦拭着，一边擦一边说：“以后要熨衣服就带过来，一只羊是放，一群羊也是放，我顺手就帮你熨了。知道吗？熨这种毛料衣服，熨斗下面一定要垫一块湿的白毛巾，这样熨出来的衣服不会发亮，而白毛巾不会褪色污染衣服。”程叔叔双手抱拳，连说：“谢嫂夫人！”

程叔叔走后，母亲对父亲说，应铨可能是想赌一口气，非要找一个年轻漂亮、比前妻强的女人。但我看，这个姑娘不像是能伴他共患难的人。

父亲皱皱眉说，“尊重隐私就是尊重朋友。这种个人的事情，最好少问少谈。梁先生和林洙的事，我一直讳莫如深，从不在应铨面前提起，也闭口不谈他的婚姻。那是人家的伤口，万万碰不得的。再说，林洙离婚了，梁先生鳏居多年，人家两情相悦，不管是非曲直，别人都没有资格说短道长。”据说，程先生和那女孩子之间的关系维持了多年，最后还是一拍两散，无疾而终。

1963年，我从师大女附中毕业进入北京师大二附中的文科实验班。这是邓小平、林枫、普安修等领导人亲自过问的教改试点单位。为检验教学成果，上级决定

我们全班在高中二年级时跳级参加高考。我幸运地考入北大中文系。

得知这个消息，程应铨叔叔像自己的女儿考进大学一样高兴。他兴冲冲地来到我家，把一个纸盒子放到餐桌上，“小妹，看看我给你带来一件什么礼物！”

我怔住了，他从来都叫我贝蒂，今天怎么改口为小妹了？

“我什么时候变成小妹啦，程叔叔？”我刚要伸手拿桌上的盒子，忽然被烫着似地缩回了手。因为我看到程叔叔异样的目光，就像波光潋滟的湖面上，蓦然疾驰过翻滚的云影。他神情黯然，木然无语。

“你怎么了，程叔叔？”我有些怯怯地问。

“哦……”他恍若刚刚走出梦境，“对不起，口误，我叫错了。”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，“我的女儿叫小妹。”顿了顿，又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缓缓地说：“儿子……叫小老虎。”

母亲连忙端来一杯热茶，又递过一条刚拧干的白毛巾，“骑了一路车，擦擦汗，喝口茶歇歇。”为了祝贺我考上北大，程叔叔送我一只德国蔡斯公司出品的袖珍望远镜。

“陈先生说你最喜欢看戏看剧，有了这个，坐在最后一排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右派的女儿能进北大中文系，我这个右派叔叔脸上都有光彩呢。”程叔叔说。

从父亲摘帽，到文化大革命之前，那似乎是我们生活中比较风平浪静的年代。父亲的工资比戴帽时增加了一倍，母亲不必再典当她的首饰补贴家用。大哥毕业了，分配在建工部工作，终于可以回家

了。大浪淘沙，身边往来的都是劫后余生、相知相惜的亲朋，程叔叔也是家中的常客。假日里我们一家和他一起去中山公园赏花、看金鱼，到“来今雨轩”吃冬菜包子，到北海“仿膳”吃肉末烧饼、栗子面小窝头和豌豆黄。夏天，程叔叔和父亲带我们去颐和园的昆明湖游泳，我第一次知道他和父亲游得多么好。两人从十七孔桥附近游到佛香阁，往返几个来回，有时躺在水面上仰泳，边游边聊，还不时仰天大笑。每当眼前浮现此情此景，我就常想，假如程叔叔还活着，他一定可以跟长大了的“小老虎”和“小妹”一起，享受融融的天伦之乐。在改革开放初始的年代，他亦年近花甲，凭他的才干，可以叱咤风云，大展其才。但那样一个鲜活强健的生命，转瞬就消逝了。

“文革”中，我从外地大串联回来。窝在清华足不出户的程应铨来到我家，对我一路串联的经历充满关切。我告诉他，在串联的列车上，带联动袖标的红卫兵把一个个非红五类出身的串联学生拖出来，用带着铜环的皮带把他们抽得头破血流。

“你也挨打了吗？”程叔叔问。

“差一点儿。”我告诉他，我们北大的同学不至于像中学生那么无知，带我串联的几位北大同学是部队的高干子弟，在他们的掩护下，我才死里逃生。

我对程叔叔说：“我早就想好了，如果联动的家伙把我拖出去毒打，那我就像安娜·卡列尼娜一样，宁可葬身火车轮下，也决不当众受羞辱。”

“头脚倒立的时代。”程叔叔自言自语，“也许只有永远闭上眼，才能避开疯狂。”

运动越来越离谱，大串联发展到山头林立，打派仗，武斗……但程应铨倒更加逍遥自由了。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右派，是只小小的“死老虎”，“万马战犹酣”的清华两派谁也没精神顾上他这个摘帽右派。他有更多的机会进城，不时到我家来，和我交换北大清华“文革”的一些消息，还会给我弄来一些当时热门的书籍，如《斯大林时代》、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、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》等等。可我对政治方面的书籍不感兴趣，更喜欢读文学名著。武斗中，女生无用武之地，便回家读书，能弄到的书就不分昼夜地看，看得天昏地暗。

程叔叔给我带来一本《贝姨》，一本《高老头》，“可以读读巴尔扎克。”他说。

“这两本上中学就读过了，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巴尔扎克。”我说：“他笔下的那些人，一个比一个坏，坏得让人直想吐，黑得让人眼都睁不开。我喜欢雨果，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悲惨世界》、《九三年》一部比一部精彩。狄更斯也比巴尔扎克服强。”

“能让你产生这种感觉，正说明他了不起。把丑恶和黑暗描写得那么入骨，五脏六腑都解剖得透彻，让人战栗，这本身也具有美学上的意义。对美的理解不能太狭隘了。”

在程叔叔成为“逍遥派”的日子里，我对他看得更近切了。他对音乐绘画、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知。他说，我喜欢和你爸聊天，他那些年翻译的资料都是国外最前卫的建筑思想，身在书桌前，纵横天下事。“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长也，而见者

□ 人物剪影

远。”他的工作位置，就是“见者远”。

“我们教书的，就怕闭关锁国、孤陋寡闻。唉，我也是杞人忧天罢了。什么时候才可能重新开课？遥遥无期啊！一代人断了线，几代人都接不上，这会影响到几代中国人的国民素质。”他摇摇头，神色凄惶。

1968年，工宣队进驻高校，武斗终于结束了，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。很久不见程应铨的身影，一家人都常惦念。母亲说，应铨一定也凶多吉少，怕是被隔离审查了。想不到母亲话音刚落，程应铨就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家里。

他灰头土脸，神色不安，就像身后随时会出现捕快似的。程应铨是怎样落魄也不显出一丝狼狈的人，从来衣冠整洁，潇洒淡定。右冠当头，举手投足中总是掩不住内里的轩敞不羁，傲骨铮铮。这也是父亲最欣赏他之处。

母亲拿出一条干毛巾，帮他拍打着浑身的灰尘，又倒了盆热水说：“刚从堑壕里爬出来似的，还不快洗洗。这么多天没见你，还以为你也进去了呢。”

他苦笑着说：“快了。不瞒你说，还真是从堑壕里爬出来的。这几天，根本就沒回家。”

“那你去哪儿了？”

他往脸上涂着肥皂，揉搓着，我看不见他的表情，只能听到他的声音，“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，我没敢回家，就是觉得随时都会被他们抓走。”

“抓走？你怎么知道？不就当过右派，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？”

“工宣队找我谈过话了，说我在缅甸当过美国人的翻译官，是隐藏的特务。”

“让他们说去。这年头，往人堆里抽一鞭子打倒一片，保证十有八九不是叛徒就是特务。”我说。

母亲朝我挥挥手，“别打岔，说正经的。那你睡在哪里？清华同事家？”母亲问。

“这种时候，往谁家躲都是添祸，我晚上睡在外面。”

“外面？火车站还是汽车站？寒冬腊月的，不要命了！”母亲惊呼。

“没有。我在清华西门的干河沟里过夜，已经好几天了。”他轻声说，“我知道抓进去是什么下场，可我也知道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早晚逃不掉的。”他已经擦干了脸，衣服也显得比刚才干净了许多。但我不敢抬头正视他的眼睛，我知道程叔叔是个自尊心多强的人，我正视他的脸，就等于正视他的伤口。我转过身背对着他，却忍不住用手抹了抹眼睛。

“要不，来我家避几天吧？”母亲的眼睛也湿润了，“这儿离清华远，他们想不到我们这儿的。”

“对对。”我和妹妹异口同声。“就在我家挤挤，也比在干河沟里强。”

“谢谢，谢谢这么多年你们一家对我的情义。”他边说边从挎包里掏出一只牛皮纸口袋，“礼遇之恩，来世还报吧。”

“呸呸，乌鸦嘴。”母亲把一盆脏水端出去，“我今年整五十了，还没说过这种丧气话，你才四十几岁，以后日子长着呢。”

程应铨叔叔把牛皮纸口袋放在桌上说：“这里面都是你们的照片和底片，万一抄家，顺藤摸瓜找上来，会给你们惹麻烦。所以，我把手边的照片都给朋友们

送去。嫂嫂、小妹，你们多多保重，陈先生在里面，别忘了去看看，送些烟进去，我这位大哥离不开烟的。”

他一直称父亲“陈先生”，称母亲“嫂夫人”，还是第一次改口叫“大哥”和“嫂嫂”，想不到也是最后一次。母亲哽咽了，我没有纠正他第二次叫我和弥尔“小妹”。也许，他心里惦念着女儿小妹，惦念着远在上海的兄嫂，就把我们当成了他的亲人。他拒绝了我们的挽留，在1968年冬日的暮色中离开了我们家。我们和母亲望着他高大的背影越来越远。谁想得到，那竟是我们与程应铨叔叔的永诀。

从那以后，很久很久听不到他的消息。两个多月以后，我们从大哥清华一位同学的口中得知，程应铨于1968年12月13日，在已经结冰的清华游泳池中自尽。一个水性那么好的人，选择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，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必死的决心。临死前，他身上穿着去东欧访问时的崭新西装。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中，他也让自己衣冠整洁，保留人生中一份最后的自尊。

原载陈愉庆《多少往事烟雨中》，北京，中国书籍出版社，2007

甘为基石的地质人生

——追忆新中国第一代杰出地质学家池际尚

○赵湘华



20世纪80年代末，池际尚在办公室备课

“我的晶体光学就是池际尚教授讲的，她不是仅仅讲一堂课，而是整整给我们讲了半年。至今，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她的音容笑貌，她讲得是那么清楚、那么深刻，甚至费氏台的操作她都已经进

行……”这是2005年9月9日，温家宝总理在接见全国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代表，提到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时，对恩师池际尚的回忆。温总理通篇讲话754个字，其中有250个字是在表达对恩师池际尚先生的崇敬和思念之情。

不久，温家宝总理致信中国地质大学原校长赵鹏大院士：“赵鹏大校长，送上我的一篇讲话。我以这篇文章献给我敬爱的老师池际尚教授。我常怀念她。”

池际尚，这位让总理难以忘怀的岩石学家、地质学家，虽然已经辞世16年，但对当今教育界的垂范作用依然巨大：在许多大学，掀起了教师群体学习她高尚师德的热潮；在她的家乡湖北省武汉市，光谷